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3.013

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重要变化及其跨界创新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分析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新变,挖掘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中的新信息、新资源、新能量,以及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的修辞学术空间开发。重点聚焦新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中的三大重要事件:一是法国学者互文性理论创始人克里斯蒂娃作为主角、中国学者推动和参与的互文性研究如何在语言学科内外创新修辞研究。二是中国学者作为主角和推动者、国外学者参与的“强制阐释”讨论如何与修辞阐释构成语言学科内外的潜对话。三是在中国修辞学界重大事件交汇的2022年回顾与前瞻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中的修辞学史叙述体制,这也将是后陈望道时代中国修辞学科重建应该面对的语言学科内外的学术生产力并做出回应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学术生产结构;语言学科内外;修辞研究;跨界创新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3-0103-14

有关修辞创新性研究的话题,段曹林比较细致地梳理了21世纪以来的文献,其观察点相对集中在语言学科内部修辞学界的研究^①,而语言学科内部修辞学和非修辞学的跨界互动研究,则可以期待傅惠钧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语言视域中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20&ZD298)系列成果。涉及语言学科内外的跨界修辞研究,有高群的《跨学科视野下的修辞研究——以2013年CSSCI来源期刊为考察对象》、谭学纯的《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高群的《二十年广义修辞学研究可视化分析》触及跨界风景^②,但限于文学学科和修辞学科的学术生产。

现有文献显示:语言学科内外跨界修辞研究,似乎还较少关注不同知识系统针对相同、相近、相关问题的前沿研究聚集创新能量的意义,及其产生显性的学术共振或隐性的对话潜质——这是可

以在更大格局中回溯历史、直面当下、前瞻未来的跨界创新动能。在时代大变局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创新气象中语言学科内外修辞研究跨界学术共同体的广泛参与,释放了学术生产力,也更充分地激发了学术生产的创新动能。本文的考察,着眼于近十年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的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挖掘并阐释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中的重要信息。

一 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和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新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近十年的高频使用概念,衍生出“XX共同体”次级概念群,“学术共同体”是其中之一。

不同于语言学科的非修辞研究基本上是语言学框架之内的学术生产,修辞研究是跨界语言学

收稿日期:2023-02-17

作者简介:谭学纯(1953—),男,安徽芜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广义修辞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①段曹林:《新世纪以来中国修辞研究的创新》,《修辞研究》2021年第2期。

②参见高群:《跨学科视野下的修辞研究——以2013年度CSSCI来源期刊为考察对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谭学纯:《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高群:《二十年广义修辞学研究可视化分析》,《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科内外的“学术特区”^①。修辞研究的跨界学术共同体包括:语言学科之内,以修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共同体;语言学科之内,以非修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共同体;语言学科之外,兼涉修辞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以上三者简称小同行、大同行、超同行^②。修辞研究跨界学术共同体具有差异性,最突出的差异性在于修辞观,即便同一层级的学术共同体,如小同行,所定义的“修辞”也不尽相同,而汉语背景和外语背景的小同行的修辞学术生产路线也不尽相同。即便相同的修辞观,例如“超语言学”^③修辞观,小同行和超同行的修辞学术生产不仅话语体系有别,研究范式也有别。但这不影响差异性的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中国修辞学术生产,以及由此凸显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

张虹倩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统计分析表明,CSSCI来源期刊发表修辞研究文献总量语言学专业期刊少于非语言学专业期刊^④。因为跨界修辞研究的经历^⑤积累了对跨界学术生产的敏感,笔者注意到张虹倩的宏观统计数据背后文化资本重新分配所形成的学术新格局:中国当代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不是意外的临时性变化,而是意料之中的趋势性变化;不是零星的结构性变化,而是规模化的结构性变化;不是仅限于语言学的修辞研究呈现了趋势化、规模化的生产结构变化,而是超语言学的修辞研究更为活跃地推助了趋势化、规模化的生产结构变化;不是仅限于修辞研究成果流向目标刊物的结构性

变化,而是包括了修辞研究主体作为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撬动的修辞学术生产的结构性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已发生的“实然”,蕴蓄着21世纪中国修辞学史叙述体制与之共变的“或然”。

国内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修辞研究从语言学场域向超语言学场域开放。学术生产权限覆盖语言学科内外的修辞研究,一方面可以比较合理地说明:为什么以语言为媒介的修辞学术生产往往不是修辞本体意义上的,而是文学修辞、新闻修辞、传播修辞、政治修辞、法律修辞、历史修辞、哲学修辞等?^⑥另一方面也可以比较合理地说明:非语言媒介不同知识类型的视觉修辞^⑦、程序修辞^⑧、建筑修辞^⑨、服装修辞^⑩、时尚修辞^⑪、音乐修辞^⑫等何以可能?

虽然语言学科内外包括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的修辞研究早先已经进入张宗正《理论修辞学》的宏观视野,但是由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在语言学科之外的显示度高于语言学科之内的显示度,则是后陈望道时代中国修辞研究的新征象。陈望道修辞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至后陈望道时代保持强大气场,不影响后陈望道时代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近十年更显突出的事实判断。

这种事实判断同样基于文献检索:选择中国知网“高级搜索”栏,在“主题”检索项输入“修辞”,在“文献来源”检索项输入人文社会科学领

①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谭学纯:《融入大生态:问题驱动的中国修辞学科观察及发展思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③“超语言学”是《巴赫金全集》高频使用的概念,指的是超出语言学范围的内容。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按:巴赫金的解释不能涵盖研究内容在语言学范围内而研究目标溢出语言学范围的研究对象,所以笔者变换“超语言学”的认定参照系,将超语言学的修辞研究解释为:研究目标不指向语言学问题、或不限于解决语言学问题,研究范式不呈现语言学面貌的修辞学术生产。参见高群,谭学纯:《广义修辞学研究——谭学纯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④张虹倩:《中国学术期刊修辞知识生产的可视化分析》,《当代修辞学》2021年第3期。

⑤谭学纯:《〈文艺研究〉和我的跨界学术读写》,见金宁主编《〈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文艺研究》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241页。

⑥谭学纯:《政治修辞:中西对比镜像——兼谈修辞学术生产隐蔽的问题》,《海峡人文学刊》2023年第1期。

⑦刘涛:《视觉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吴琼:《柱子的隐喻:十五世纪意大利“圣母领报图”的神秘神学》,《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⑧刘涛,曹锐:《程序修辞的概念缘起、学术身份与运作机制》,《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4期。

⑨张野,曾馨:《中国设计修辞研究二十年:起源与展望》,《装饰》2018年第11期;冷先平:《图像、表意与视觉修辞策略研究——以明清鄂湘赣移民民居建筑装饰图形为例》,《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22年第2期。

⑩陈晓云,缪贝:《红地毯上的中国影星:身体表演、服装修辞与视觉政治》,《当代电影》2012年第8期。

⑪张爱红:《时尚修辞的自由——修辞学视域中罗兰·巴特大众文化新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⑫王旭青:《音乐修辞的历史溯源及考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研究》2016年第4期。

域高显示度刊物名,检索结果显示:《中国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文艺研究》《音乐研究》《美术观察》《装饰》《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电影艺术》《戏剧艺术》《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法学》《法学》等刊发表的修辞研究成果,数量远远多于语言学期刊《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语文研究》《语言研究》《语言科学》《中国语言学报》《古汉语研究》等的成果。修辞研究的成果流向反映了学术生产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息:修辞研究在语言学科之外的参与度高于语言学科之内,但体现语言学面貌的修辞研究的学术表达强度在语言学科之外弱于语言学科之内。从学科元话语考量,语言学科内外的学术话语,之于语言学/非语言学刊物审稿、择稿、用稿或拒稿,均体现某种“知识的权利”。《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许章润《论“家国天下”——对于这一伟大古典汉语修辞义理内涵的文化政治学阐发》,溢出语言学知识谱系的汉语修辞义理分析,延伸到基于这一义理的文化政治学阐释,分析汉语“家国天下”修辞表达双重四位一体的间架结构:文明时空、政治想象、世界图景、道德理想四位一体和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公民憧憬四位一体,分际合围,并立组合,托付于这一立基于人道理想的文教本质性与充盈普世情怀的典范性价值真实。“论‘家国天下’”副标题所显示的对于“汉语修辞义理内涵的文化政治学阐发”,在语言学科内外的知识图谱,更易于连接“作者表达一审稿人/编者接受”的修辞通道。而语言学科熟悉的学术表达,会遭遇没有“语言学”栏目设

置的《学术月刊》出版物元话语的拦截。这是个案,但不只是个案,它体现了非语言学刊物接纳具有语言学科身份的修辞研究成果的“准入条件”,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修辞作为“语言运用艺术”这一近乎公共认知的表达,能否在知识谱系学的意义上覆盖语言学科内外的修辞研究。这是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的重要看点——从重大事件到学术细节的新信息、新资源、新能量,都蕴含在这个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中。

二 语言学科内外多声部理论构成的“互文性”:聚焦修辞创新性研究

2012年,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访问复旦大学。这是十年前的重大学术事件,中国学者祝克懿推动了这一学术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从克里斯蒂娃接受复旦大学校长函邀,加盟“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就互文性理论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到结束学术访问的“后演讲效应”: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丛书^①、《互文性与互文语篇研究——“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四辑)》^②,三联书店出版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③;从克里斯蒂娃接受《当代修辞学》聘请,担任该刊学术顾问,到《当代修辞学》于2012年第4期起特设《互文理论名篇选译》专栏,先后刊载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首次全面阐释互文性理论的经典之作《词语、对话与小说》^④,以及《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⑤,再到《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2013年第4期、第5期互文性研究专栏主持人话语传递的学术信息,“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⑥在语言学科内外汇聚修辞,并在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新变中彰显重要的理论价值。

约略在《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推出《互文理论名篇选译》专栏的同时,《文艺研究》2012

①参见祝克懿主编:《克里斯蒂娃自选集》,赵英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符号学:符号分析探索集》,史忠义译,《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马新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祝克懿主编:《互文性与互文语篇研究——“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③祝克懿,黄蓓编译:《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三联书店2016年版。

④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与小说》,祝克懿、宋姝锦译,《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该期该栏目主持人祝克懿介绍了这篇互文性经典文献的理论价值。

⑤参见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与小说》,祝克懿、宋姝锦译,黄蓓校,《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5期。

⑥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武士)、张东荪、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年第8期吴琼《互文的间隙——〈蝴蝶君〉的跨文化伦理学》，在语言学科之外发声，分析跨文化语际差异如何涂抹人们的东方形象书写及其表征的伦理意义的互文性运作：普契尼为西方世界想象东方女性形象提供的脸谱化标本歌剧《蝴蝶夫人》，被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以逆写手法解构西方的蝴蝶夫人情结，后者依据真实故事创作的剧本《蝴蝶君》又被加拿大籍电影导演柯南伯格搬上银幕，对黄哲伦的反东方主义话语进行修辞幻象处理。这种修辞幻象时或见于东西方互为他者的异域想象，《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6期谷鹏飞《自我视域中的他者与他者镜像中的自我——美国〈文心雕龙〉翻译文本中的“经典重构”问题》分析美籍学者施友忠等翻译《文心雕龙》过程中对源文本的语境还原、对副文本形式重构与中西范畴的互文性比勘，阐释《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修辞学史的互文性空间对比镜像，其翻译过程交互映现着自我视域中的他者和他者镜像中的自我。本土经典在美国文学语境中的重构，叠现异域想象的修辞空间。

文学史研究的惯性思路，着眼于“变迁”和“影响”，区别于依据这种可能漏失重要信息对重写文学史科学性的影响的纵向坐标的考察，互文性研究横向考察明代“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长期处于彼此“互动”“互渗”“反哺”状态的问题。《学术月刊》2013年10期李桂奎《从共时视角看“四大奇书”之互文性——兼谈其对文学史写作的启示》系统把握“四大奇书”的互文关系，为重写文学史提供再观察与再叙述的修辞视角。基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修辞考察，也见于从读文时代到读图时代，再到语图互文时代的转换中，《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龚善举《图像叙事的发生逻辑及语图互文诗学的运行机制》论述图像叙事转向语图互文诗学的发生逻辑和修辞运作，展现话语权力和图像权力互文性建构的意义秩序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当代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隋岩、唐忠敏《网络叙事的生成机制及其群体传播的互文性》论述网络叙事围绕同一事件相关体，具体文本与文本集合体的前文本、后文本、同步文本的有机构成，形塑网络文本的互文性及其阐释系统，其影响公众情绪的修辞能量，影响了社会交往乃至人类思维方式。传统的新闻生产边界固定，以

组织化、专业化为重要特征，微信新闻生产以互文性的方式呈现，多重连接，交叉并置，不断创造出含混、多维的意义，对此，《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4期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分析微信新闻生产的互文修辞重塑人们的时空体验，表征新的新闻范式。《现代传播》2021年第9期张丽、刘念《互文叙事与感官重塑：融媒体时代的新闻文本特征》分析新闻意义产生于文本之间相互关系的融媒体互文叙事。

作为修辞学术生产的“生产性”与文本互文性的运动，同样是一个可以挖掘新看点的话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文艺研究》2022年第5期姚文放《文本性/互文性：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分析互文性理论受马克思“作为生产模式的历史”的启发，以生产性文学批评为支点，依次分析巴赫金的互文性思想关于生产性的端倪和克里斯蒂娃最初厘定的“互文性”概念，提出“文本是一种生产力”构想；巴特为《大百科全书》撰写“文本理论”词条，将“生产力”列为条目并进行讨论。而将互文性理论泛化的修辞学派对互文性的生产性也体现出较强的自觉意识。姚文放的考察偏于宏观，相同话题的微观分析如《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赵敦华《〈资本论〉和〈逻辑学〉的互文性解读》运用互文对照，分析《资本论》前5章与黑格尔《逻辑学》“存在论”和“本质论”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展示马克思批判性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创造性地建构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形式的体系；另一方面展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方式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充实和丰富了对黑格尔逻辑学经验内容的新理解。

语言学科之外接近语言学科之内的学术理路，但区别于后者的互文修辞研究，均和甲骨卜辞的意义再生产有关：《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林甸甸《从贞人话语看早期记录中的修辞》在仪式语境中考量甲骨卜辞文本，重视文本的刻写位置、行款连续性、命辞、占辞、验辞的互文关系，以其作为文本的构成要素乃至修辞手段。同时，分析贞人话语以反常规的刻写形态和反复、递进等修辞方式，以近似“春秋笔法”的“记录”本身构成修辞，间接彰显价值判断，显示了中国修辞传统精英化、书面化的起源特征，以及监督、褒贬王政的功能指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吴承学、李冠兰《文辞称引与

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研究》,虽未使用“互文性”概念,但分析甲骨卜辞中一些表示言说行为的称引提示词反映人们当时已认识到所称引事物内容以及文体形态的特殊性,似可理解为文体观念萌芽中存在言说行为称引提示词及相关文体形态互相指涉的意义空间。

语言学科之外不同知识谱系的互文修辞研究,体现了多声部理论构成与批评实践的中国化探索;语言学科之内的互文修辞研究,则体现互文理论与实践中国叙述的语言学化努力。后者以《当代修辞学》为高关注的话语集散地,主要研究成果收入祝克懿主编“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互文性与互文语篇研究》。

祝克懿解析“语录/语录体”的体制和概念意义、“语录体”源起与“记录/摘录”互文手段的实现路径、语体特征、语体系统、古今语录体分化和融合的外部条件及内在理据。语言学面貌清晰地揭示了伴随着现代科技进步的全民语言狂欢的交际需求,“语录”概念内涵外延从至尊圣贤话语泛化为人人可以生产和发布的信息。新媒体语境支持的“语录体”也在流变中呈现出现代修辞学、社会语言学意义上文本意义多维整合的类型特征。沈家焯用当代语言学眼光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传统文论术语“互文”和“联语”,详析汉语的组织构造和传情达意具有“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的性质。互文和联语源自语言的原生形态“对话”,受语言处理效率的驱动,也与减少语言信息处理成本有关,因此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的一部分。邓隽、刘大为研究由新闻主报道文本、若干能对主报道进行阐释的解读文本,以及能在这两种文本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功能标签组成的组合性文本,分析解读文本所提供的不同类型信息以及相应的功能标签,据此认为互文概念对这种新闻文本结构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进而探讨互文概念语言学化,提出心理联想互

文、文本印迹互文、语言形式互文三种依次包孕的互文类型,认为最后一种类型才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互文本的进入和互文标记两种语言形式,并区分了内入式互文及其区分标记与外接式互文及其接引标记。马国彦从话语分层和言语行为角度观察互文的元话语和基本话语之间的层次关系,以及由它互文和自互文共同支撑的文本结构。基于文本结构面貌和组织格局,探讨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以经受一定程度的语法化而规约为形式简短的元话语作为标记的主文本,接纳发话者自己的话语为互文本的自互文结构,分析自互文结构的三种类型:明示主观情态自互文、明示人际互动自互文和明示话语组织方式自互文^①。姚远基于文本间关系的分析异曲同工:依据前文本与承文本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距离所产生的对话空间,揭示区别学术拷贝和引用越界的互文性生成与理解规律^②。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黄小平《注释、参考文献与新闻类学术语篇的互文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陈昕炜《中国古典小说序跋语篇之互文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宋妹锦《文本关键词的语篇功能研究》等,审视不同类别的文本互文性,阐释其语言学机制,而出自语言学科内外的视角。结合复旦大学近年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论文关于互文性研究的规模化学术生产,更彰显“互动·多元”的哲学方法论要义^③。

在创新学术产品的意义上,语言学科之内的互文修辞研究更重要的学术价值是重建了互文性研究同时指涉语言学科内外的意义秩序。《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武士〉、张东荪、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基于文献打捞,阐释多元构成的互文性理论认知及其思想传承与创新,分别论述作为法国学术思想编年史的《武士》和克氏人生镜像、

①参见祝克懿:《“语录体”的源起、分化与融合考论》;沈家焯:《“互文”和“联语”的当代阐释——兼论“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邓隽、刘大为:《解读性新闻中的互文关系——兼论互文概念的语言学化》;马国彦:《元话语标记与文本自互文——互文视角中的篇章结构》;陈昕炜:《边界互文性的实现机制与分布规律》;殷祯岑:《语篇意义的自组织生成——耗散结构理论观照下的互文语篇分析》;祝克懿主编:《互文性与互文语篇研究——“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4—311、60—84、213—234页、254—270、354—373页。按:语言学科之外通常所说的“文本”,很多情况下大致相当于语言学科之内的“语篇”。本文引述话语尊重来源文献,直接引述文献篇名或文献内容时,还原来源文献的“语篇”概念;自述话语使用“文本”概念,以使不同来源文献的术语不一致分别在本文的引述/自述系统中统一。

②姚远:《基于篇际关系的承文性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③王志军:《语篇副文本的互文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

中国哲学家张东荪中西哲学理念对克氏互文思想形成的影响、克氏与巴赫金互为成就的关系与克氏对本维尼斯特结构主义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克氏互文研究打开的理论空间。《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1期黄鸿辉、祝克懿《体裁风格分析程序及互文生成路径——以笔记小说经典文本的体裁风格为例》从历时和共时视角分析历代笔记小说经典文本体裁结构的嬗变,在纵向坐标上回溯历史文化互文语境;在横向坐标上拓展语言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张虹倩《章太炎政治学术的互文及其对场域规训的体认——基于章太炎对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重新解释章太炎看似矛盾、实则互文见义的学术保守与政治激进,由章氏对出土文献的态度可见其“保守”中的严谨和对学术场域内在逻辑的尊重,认为章氏在学术场域的严谨与政治场域的激进均基于对不同场域内在规训的深刻体认,矛盾的表象内蕴了互文见义的深层统一。

学术史是正文本和副文本互相映射的互文性空间:作为对正文本的修辞加工,副文本解说、证明、强化正文本的同时,兼有正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认知引导和话语扩张功能。正文本没有言明的问题可能在副文本中观点鲜明地出场,正文本没有言尽的问题可能在副文本补足或进一步暗示。《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2期张虹倩《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基于副文本目录的考察》由副文本目录指向的变迁,系统梳理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修辞构筑的嬗变,指出贯穿其中此消彼长的革命性导向与文学性导向主线。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出现当代文学史构筑的修辞策略,同时指出文学史叙事缺失语言学视角,探索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另一种叙事的可能。同一作者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的《早期语法学家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于早期语法著作中现代白话语例的考察》,认为语法学著作征引文学作品语例既是证明语法学理论的过程,也包蕴了语法学者对于作家作品规范度和典范性认知的修辞行为。借此考察一种基于语法规范的价值取向而展开的区别于以往文学史家认知

的叙事图景,诠释现代汉语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互文共生价值。

语言学科内外基于正文本和副文本互文性关系的研究,除了单篇论文,也有相对集中的文献记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王志军《语篇副文本的互文机制研究》对热奈特关于“副文性”的研究范围深度有所延展,采用宏观架构和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学术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副文本系统配置、副文本与主文本和更大结构中的文本世界之间的耦合互文方式、互文修辞效果、修辞动因以及互文的认知机制。湘潭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谭学纯《思想和话语:广义修辞学副文本》,以“思想”和“话语”串联20多年来广义修辞学副文本在正文本之外的话语空间参与中国修辞学研究当代转型和学科形象重建的学术信息。书中辑录19篇序跋以及作者在几家刊物主持60期修辞研究栏目或专题的编者按/主持人话语互文性地建构意义秩序,也许是目前可以见到的第一部聚焦一种修辞观、汇集一位作者的学术副文本,也是透视修辞研究多元格局中的学科创新意识和学科发展思想轨迹的独特窗口。

国内互文性研究始于20世纪末,但修辞学界的规模化介入则是近十年的事情。2012年以来,《当代修辞学》刊发了40多篇互文研究成果,跨界特征鲜明的学术生产由于修辞学界的深度介入而展示了不应该缺少的语言学维度。互文性理论创始人克里斯蒂娃系列演讲是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复旦大学作为客场的主场,《当代修辞学》主编的推动和建设性参与,是这一重要学术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前,国内修辞学科与众多相关学科就某个重要领域的研究形成学术市场共振效应的态势几乎没有发生过。互文修辞研究释放了这方面的能量,修辞学术生产不同知识谱系在一定关系场中的相互运动,推动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走向纵深。由于跨界研究的方位和层级是开放的,创新能量在一个新的意义空间相互注入的可能性也是开放的,其创新价值因跨界而促进了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①。

历时地看,克里斯蒂娃互文理论的“多声部交响”与《文心雕龙·隐秀》“秘响旁通”穿越千

^①金惠敏:《技术与感性——在麦克卢汉、海森伯和庄子之间的互文性阐释》,《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年,互相激荡:刘勰的“秘响旁通”似可视为当代西方的重要理论在古代中国的“前表达”。“秘响”作为隐于当前文本之外的“声音”之所以“旁通”的学术生产机制在于:从来源文本的叙述结构分离的信息碎片及其旧有的意义,重建为目标文本的叙述结构及新的意义秩序。来源文本中熟悉的信息资源转化为目标文本中另一个阐释维度的陌生信息资源,随着来源文本的信息碎片转换为目标文本的再叙述,来源文本的隐含信息(“秘响”)在目标文本的叙述结构中浮现(“旁通”)。

共时地看,现象层面的“多声部交响”在哲学的“间性”^①意义上进行创新编码和解码。以文本为主要观察与分析单位的互文性研究,普适的方法论意义彰显了基于“间性”的重新审视——以学科间性重新审视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体间性^②、语体间性^③、模态间性^④、风格间性^⑤、文化间性,及其蕴含的理论间性^⑥、术语间性^⑦、范畴间性^⑧、范式间性、事件间性、主题间性^⑨、数字间性^⑩等。对于注重跨界知识关联的修辞学术生产而言,体现学科间性的互文性既是理想的切入点,也是理想的观察扇面。而互文修辞跨界研究本身,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科间性对不同学科的理论间性、实践间性的创新性激发。

互文性理论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阐释了学术生产的可能性,诸多可能性中的修辞选项与修辞贵在创新的本质相遇。由于互文性理论认为只存在文本间的关系,不存在孤立文本,对此,极端的理解可能导向学术模仿和拷贝的合法化。其实,考

量创新性研究或复制性研究,可以依据当前文本是否重建了相对于此前文本的新的叙述结构和意义秩序作为可控变量和参照指标。排除单纯模仿和学术拷贝的互文机制是:从源文本结构中分离出的信息碎片,经过碎片管理阶段的预加工,进入目标文本的再叙述结构,再叙述阶段的组织加工,同时重建了目标文本的叙述结构和意义秩序。而跨界研究比单一视点的研究更有助于重新发现当前文本的叙述结构和意义秩序如何在新的维度重新编码和重新解码。只有在清楚当前文本相对于此前文本丢弃了什么、过滤了什么以及为什么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当前文本相对于此前文本重建了什么,刷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就此而言,蒋寅认为互文性不仅包括“拟”,也包括“避”,并将后者称作“隐性的互文”^⑪,是有道理的。

三 语言学科内外:有关强制阐释的讨论和修辞阐释的潜对话

2014年起,张江作为主角推动的有关强制阐释的讨论,是又一重大学术事件,也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罕见风景。诸多学术形象持重的刊物强势介入,学术人气旺盛的话语频道集体发声,多位非本土学者积极参与,汇聚了中外视点。张江本人在提出“强制阐释”概念之后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20多篇,主要文献见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

①不无巧合的是,“间性”这一跨越东西方哲学的概念也在2012年出现,随后进入学术生产。参见张先广,麦文隽:《主持人序:间性研究——阈限时空中的探险》,《东方丛刊》2019年第2期。

②参见泓峻:《汉语文学的文体意识及文体互渗》,《中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魏宏远,徐佳慧:《文本建构与历史重塑:王世贞传文体互渗论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陈桐生:《上古文体趋同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谭帆:《论小说文体研究的三个维度》,《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

③参见闪洪:《文艺语体交叉渗透的互文类型与实现路径》,《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6期;尉薇:《通俗科技语体的否定互文性与互动机制研究》,《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6期。

④参见顾日国:《多模态感官系统与语言研究》,《当代语言学》2015年第4期;张德禄,王正:《多模态互动分析框架探索》,《中国外语》2016年第2期;张德禄,胡瑞云:《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系统、选择与供用特征》,《当代修辞学》2019年第5期。

⑤刘婉晴:《“风格互文”现象的描写解释与特征识别》,《当代修辞学》2021年第1期。

⑥周毅:《“征圣”、“宗经”和传统艺文互文刍议》,《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3期。

⑦参见黄卓越:《19世纪汉学撰述中的 literature: 一个概念措用的历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钱志熙:《汉魏六朝“诗赋”整体论扶隐》,《文学遗产》2019年第4期;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王确:《汉字的力量——作为学科命名的“美学”概念的跨际旅行》,《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⑧丁金国:《互文性的语文学阐释》,《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3期。

⑨黄兵:《论“主题互文性”及在语篇研究中的阐释力》,《当代修辞学》2019年第3期。

⑩张先广,杜丹:《对数字技术的间性论思考》,《哲学分析》2019年第3期。

⑪参见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文史哲》2012年第1期。另见谭学纯:《学术文本读写转换之二:碎片信息管理及再叙述》,《当代修辞学》2018年第2期。

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文艺研究》组织了具有集约效应的讨论,不到三年时间集中刊发了4组12篇文章:2015年第1期,张江与朱立元、王宁、周宪关于强制阐释的笔谈^①;2015年第7期,张江与希利斯·米勒关于强制阐释的通信^②;2016年第8期,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特征的论述,以及4篇国外强制阐释相关理论的译介^③;2017年第6期,张江与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恩蒂、凯撒·贾科巴齐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④。

虽然J.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张江》和毛宣国《“修辞性阅读”与文学阐释》^⑤隐约打开了强制阐释批判和修辞阐释的对话空间,但修辞学界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语言学学科之外的讨论。区别于互文修辞研究的显性跨界共振,强制阐释批判和修辞阐释跨界语言学学科内外的潜对话信息需要一种学术链接:修辞阐释为何以及如何强制阐释的问题空间“接着说”。

依据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规定及相关说明,强制阐释的突出特征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⑥。

可以由修辞研究“接着说”的逻辑前提是:强制阐释主体和修辞阐释主体都是阐释行为的发出者,也都是阐释对象的读者,阐释活动是同一阐释主体以表达者(作者)和接受者(读者)的身份共同在场、以阐释对象为中介的互动,强制阐释和修辞阐释的行为发生,意味着阐释主体完成了读写身份转换,即同一阐释主体的当前行为是基于接受的表达^⑦。这种基于接受的表达,存在强制阐释

和修辞介入的不同可能性。

在阐释主体从强势读者身份转换为强势作者身份的条件下,阐释主体同时操控阅读文献的解释权和重启学术叙述的话语权。这一层次的阐释行为,理想状态是忠于文本,但也最有可能修辞化地“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阐释主体读写身份转换以及转换过程中的修辞介入,比起理论上对强制阐释的警惕,有更多的变数。被罗蒂“强制阐释”或“强势误读(strong misreading)”的海德格尔、尼采、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戴维森等,其中不乏极度不满者与罗蒂的阐释做出切割,但也不乏在罗蒂的修辞诱导中重新协调自己与罗蒂的立场^⑧。那么,罗蒂强制阐释的修辞诱导机制是什么,现有的探讨似乎少有涉及。

在阐释主体的强势读者身份压制相对弱势的作者身份的条件下,可能强制阐释“难作为”。这种状态下,阐释主体的执行力不支持“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

在阐释主体的弱势读者身份转换为同样弱势的作者身份的条件下,“前在立场和模式”的负性渗入,可能导致强制阐释“乱作为”。这种状态下,阐释主体的认知力和执行力可能都不支持“论者主观意图”的学术表达。

在阐释对象不是阐释空白的条件下,阐释主体需要摆脱“前在”阐释的压力。“前在”阐释越丰富,摆脱“前在”阐释的压力越大。尊重但不复制“前在”阐释积累的已知信息,提供当前阐释发掘的未知信息,是创新性阐释的要求。阐释主体

①参见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朱立元:《关于“强制阐释”概念的几点补充意见——答张江先生》;王宁:《关于“强制阐释”与“过度阐释”——答张江先生》;周宪:《也说“强制阐释”——一个延伸性的回应,并答张江先生》,《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

②参见张江:《确定的文本与确定的主题——致希利斯·米勒》;J.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张江》,王慧慧译,《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

③参见张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科莱特·卡墨兰:《源出“法国理论”文学批评的“强制阐释”》,涂卫群译;西格丽德·威格勒:《文学、文学批评及文本可读性的历史指数》,薛原译,《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

④张江,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恩蒂,等:《文本的角色——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文艺研究》2017年第6期。

⑤毛宣国:《“修辞性阅读”与文学阐释》,《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

⑥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前见与立场》,《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⑦谭学纯:《学术文本读写身份转换:理论阐释与样本分析》,《当代修辞学》2017年第3期。

⑧参见张雅卿,刘亚猛:《罗蒂的话语策略与新实用主义的崛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按:张雅卿、刘亚猛概括罗蒂的话语策略之一是“强势误读(strong misreading)”,与“强制阐释(imposed interpretation)”具有不同的能指形式,但从“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的所指内容及阐释路线说,这里的“强势误读”似可看作“强制阐释”的另一种表达,张江批评的“强制阐释”,也有“主观性”很强的误读成分。

为了摆脱“前在”阐释压力,部分地选择修辞阐释,实现阐释创新,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把握强制阐释的临界问题。

阐释是面向文本的阐释,文本是阐释的确定性对象,但这种确定性不限于呈现为某种传播形式的可见文本^①,一些溢出文本的不可见因素,同样是影响阐释确定性的资源,有时候甚至是更重要的阐释资源。在文学被非文学重新定义、温和的文学批评转向非文学的话语暴力的情境中,仅仅面向可见的文本,遮蔽某些隐性的阐释资源,例如权力干预的文学向非文学妥协,有无可能成为强制阐释的样本?文学指向政治确定性的阐释过程中修辞可能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修辞韬晦能否以及如何弱化强制阐释?修辞加码能否以及如何助力强制阐释?董瑞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话语分析》,提供了强制阐释关联修辞阐释的个案。董著研究对象是有影响力的文艺期刊,期刊主编和编辑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寻找平衡的运作及其限度,如何运用抵制强制阐释的修辞策略留存隐性的阐释资源?这类在特定历史时期封存的隐性阐释资源何时启封?多大程度启封?这些问题作为一种特别的文本外因素,反映修辞阐释与强制阐释共谋或掣肘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钟晓文《西方认知中的“中国形象”:〈教务杂志〉关键词之广义修辞学阐释》以跨文化期刊为修辞阐释资源。《教务杂志》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1867—1941年间先后由福州美以美印刷局和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西方话语主体讲述、面向传教士与西方读者。刊物初名“*The Missionary Recorder*”(《传教记录》),曾更名“*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另署中文名称《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纪录),中文名称沿用《教务杂志》。刊行文本的主要构件包括:中文典籍原文,源文献英译,源文献注疏的部分英译、译作者评论。钟著重点阐释对象之一《孝经注疏》(*Commentary and Annotations on the Canon of*

Filial Piety,《教务杂志》1878年第5—6期连载),即包括以上构件。译作者德国汉学家恩斯特·福柏,时称“十九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从修辞接受考虑,《教务杂志》的理想读者是同时具有汉英语言能力的知识分子,但目标读者多只是英语读者,大多数目标读者以文本的英文内容为认知介体,原文与译文的结构完整性因此被碎片化,英语译文的客观性成为无本之末,“作者评论”部分才成为目标读者获取意义的真正介体。传播文本的理想读者与传播刊物的目标读者不一致,不仅阻碍了传播文本结构形式的修辞功能实现,也阻碍了传播文本信息内容的修辞传达。对于大多数目标读者而言,福柏的《孝经注疏》传播文本也许只能依靠碎片读解并辅之以修辞想象,才能构建《孝经注疏》的“完整意象”。传播文本的阐释评述部分地解构典籍原文,修辞化地重构典籍原文的逻辑结构,重构了“孝”的伦理文化特征: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价值的世俗伦理;以“子/臣”为核心主体的实践伦理。过分强调“子/臣”的伦理责任和排除“君/父”的伦理要求,很容易使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践伦理停留在理想状态,或沦为“形式主义伦理”。从西方认知审视,这是缺乏终极价值的伦理追求,无法进化到高级的“宗教伦理”。《教务杂志》包括中文典籍原文、源文献英译、源文献注疏的部分英译及译作者评论的文本呈现样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话语主体的难度:如果说重现中文典籍原文是重新历史化程序,那么源文献英译、源文献注疏的部分英译至少部分地包含了修辞重构。译作者评论则夹杂宗教关怀,福柏《孝经注疏》如此,《教务杂志》呈现此类叙述结构的文本亦如此,这也使得西方认知中的“中国社会”“中国伦理”“中国宗教”“中国历史”“中国语言”等文化主题支撑的中国形象建构,成为不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互遭遇、相互展示的异域想象。将认知对象内化为西方认知又外化为东方想象的文化产品,隐蔽地对认知对象进行修辞干预,外部世界的“他”被带有强制意味的修辞阐释为“我”的认知对象^②。

^①可见的传播形式不限于印刷文本,网络传播的非印刷文本同样携带不可见的隐性阐释资源,例如评论区的评价话语对阐释主体的影响。

^②钟晓文:《西方认知中的“中国形象”:〈教务杂志〉关键词之广义修辞学阐释》,谭学纯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页。

国内批评强制阐释的思想背景,是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直面文论危机,如何走出西方文论强势东进的话语霸权,证明理论的合法性和解释的有效性?张江以中国古代学术话语“阐/论”之辨、“理/性”之辨、“解/释”之辨、“通/达”之辨、“衍/生”之辨,论证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经由“概念—范畴—命题—图式—体系”的层级性建构,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化,构建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①。修辞研究同样传递了潜对话信息,《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修辞学大视野》专栏2018年第4期主持人话语正视西方修辞的思想外援冲击不同程度地撬动了国内学术市场的存量理论,也阐明中国立场:基于文明互鉴的学术互渗和融通不是导向理论殖民,不推动中国学者叙述的西方学说成为隐形操控本土学术生产和消费的理论无意识,不宜照着西方图纸批量“中国制造”。这可能导致的文化后果之一,是中国学术界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建构国际学术话语权不对等的话语秩序,理论上的平等对话不应该变异为俯仰对视。这方面的探索,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潘红《哈葛德小说在晚清:话语意义与西方认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郑竹群《巴赫金话语理论:以广义修辞学为阐释视角》等,运用本土修辞理论阐释汉译文学文本和学术文本。国外理论“在场”的前提,不是本土理论“缺席”,这是强制阐释批判和修辞阐释共同坚守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要义。

强制阐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阐释者的主观性,即“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而强制阐释的认定,同样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认证一种阐释结论是否属于强制阐释,很难证明认证本身是否滤尽了“主观性”。这是一个带有元命题性质的难题。认定“关关雎鸠”隐喻后妃之

德的汉儒解诗为主观性的强制阐释,汉儒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拒绝承认在汉儒看来的主观性认定,而主观性作为修辞介入的自由空间,并不必然是负性的。2021年《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南帆《论阐释的辩证平衡》,论述某些强制阐释可能出于扩张思想空间的需要,重新确定阐释对象,认为一定条件下的强制阐释可能产生积极后果,譬如利用惊世骇俗的阐释惊醒世人。尼采喊出修辞化的惊世之语“上帝死了”,思想层面的“重估一切价值”是否交织着话语层面强制阐释的“权力意志”?不管是重新确定阐释对象,还是惊世骇俗的阐释,都带有扩张思想空间的主观意图。同在2021年,《当代修辞学》第1期谭学纯《义位/自设义位:释义话语风格特征之广义修辞阐释》论述具有强制阐释特征的自设义位释义之于思想突围的冲击力,针对同一阐释对象“X”的自设义位释义,将“X”强制阐释为“非X”,将词典释义文本管控并为语言共同体共享的思想,由概念认知的确定性转向修辞认知的不确定性,实现意义再生产。重建意义秩序的可能性及其管控,同样是强制阐释和修辞阐释共同面对的问题。

学术跨界生产如何合理吸纳场外理论、慎用场外概念术语,是强制阐释讨论的另一个焦点话题。朱立元、周宪、王宁、赵炎秋、蓝国桥、乔国强等学者加入了讨论,或主张区分场外概念“征用”和“借用”、“场外征用”和术语移植;或主张客观对待理论谱系学意义上的术语“出身”;或强调术语“场外征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或认为术语“场外征用”本身也是理论建构的一种状态^②,在某些特殊情境中,甚至可能是理论创新的一种代价。在场外概念不一定制造理论紧张的跨界研究中,负面的接受可能相对少一些。“场外”理论或术语被“征用”,实际上是原属场域A的理论或术语,修辞化地进入场域B,修辞机制使被征用的理论或术语从“场外”入主“场内”成为可能。张江

^①参见张江:《“阐”“论”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理”“性”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衍”“生”辨》,《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1期;《“通”“达”辨》,《哲学研究》2021年第11期。

^②参见朱立元:《关于场外征用问题的几点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王宁:《场外征用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再识——答张江先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周宪:《文学理论的来源与用法——关于“场外征用”概念的一个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赵炎秋:《场外征用的必要性与有效度》,《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蓝国桥:《场外征用的有限合法性》,《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乔国强:《试谈文论的“场外征用”》,《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

警惕“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之强制阐释^①,对于没有修辞的修辞研究来说同样具有警示意义。修辞研究,尤其是跨界修辞研究的话语体系不乏场外征用现象,但同时修辞学界也不乏尊重术语的谨慎。《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1期谭学纯《广义修辞学与主体间性研究》主持人话语及同期谭学纯论文《广义修辞学三层面:主体间关系及相关问题》表示:学术研究尊重学术概念即尊重以概念术语形式打包的思想,选用或慎用某种学术概念,是学者选择特定的路径参与学术史建构的一种方式,是作者介入学术话语场的方式,也是作者尊重学术概念的方式。

阐释和修辞,都是个人性和公共性的统一,阐释创新和修辞创新的个体发生和公共认同,是历时意义上个人的声音转化为共时意义上公共表达的学术生产过程。但个体化阐释无法摆脱公共理性,如同个人修辞难以拒绝公共的话语资源和思想资源^②,阐释和修辞都无法脱离存储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公共阅读,这里同样存在公共阐释和公共修辞的潜对话空间。张江强调阐释的公共性关联人类的公共理性,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阐释在公共空间展开,阐释的权利为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公共精神积累。这一观点在张江与哈贝马斯、约翰·汤普森、迈克·费瑟斯通等关于公共阐释的学术对话中有不同角度的展开^③。作为与公共阐释潜对话的公共修辞,在刘涛的表述中是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诉求的议题构造与话语生产,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传播领域为主要“应用场景”,旨在回应修

辞实践中的公共性问题,借助修辞策略,维护公共空间的协商性、批判性与对话性,建立公共空间理性交往的认同基础与共识。张江所论阐释的公共性更接近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存在私人语言的公共语言,不同于刘涛所述修辞的公共性,但前者建构中国阐释话语体系的努力和后者分析公共知识的生产过程依赖于三种内在关联的修辞框架——概念框架、隐喻框架和故事框架^④,都是从专业场域到公共场域向共享学术空间发声的话语行为。

阐释有边界,而边界是变化的——这是张江与意大利摩德纳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几位学者对话的核心信息之一^⑤。而张江与图宾根大学奥特弗莱德·赫费教授的对话^⑥,以及南帆对张江追问“作者能不能死”的回应,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阐释边界的讨论^⑦。那么当有边界的阐释受到某种认知冲击而呈现出边界移动的迹象时,阐释的狂欢有无可能使得强制阐释的边界认定变得暧昧?有无可能影响阐释对象的可控和阐释结论的可信?张江认为强制阐释的要害在于阐释的路线,而强制阐释多选择修辞路线,修辞能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助推或干扰强制阐释?这需要更多的分析样本、更多的实证,才能相对清晰地解说强制阐释与修辞阐释为何以及如何胶着。

呈现为话语形式的强制阐释和作为话语行为的修辞,这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如何互相开放、互相渗透?如何分离和链接?强制阐释中的修辞干预如何发生?修辞干预的限度如何描画?强制阐释和非强制阐释在时间的推移中如何接受、拒绝或变换修辞干预?当阐释对象的“不可阐释性”

①张江:《理论中心论——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②谭学纯:《广义修辞学演讲录——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7页。

③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公共阐释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张江,约翰·汤普森:《公共阐释还是社会阐释——张江与约翰·汤普森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张江,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迈克·费瑟斯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张江,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

④参见刘涛:《网络造句:公共议题构造的社会动员与公共修辞艺术》,《江淮论坛》2012年第1期;《图像政治:环境议题再现的公共修辞视角》,《当代传播》2012年第2期;《作为知识生产的新闻评论:知识话语呈现的公共修辞与框架再造》,《新闻大学》2016年第6期;《公共修辞:话语实践中的公共利益及其修辞建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另见陈汝东:《论公共修辞学的理论建设》,《国际修辞学研究》2012年第00期;赵天:《马来西亚稀土风波中的公共修辞》,《天中学刊》2014年第5期;杨致远,王帅:《从公共修辞到社会焦虑——论新媒体语境中网络舆情的生成与表达》,《新闻知识》2015年第4期;陈亚萍:《新媒体时代的公共修辞情境研究》,《新闻传播》2016年第19期;王婷:《交互性神话、公共修辞与悬置的主体——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实践的弹幕电影》,《当代电影》2022年第6期。

⑤张江,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恩蒂,等:《文本的角色——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文艺研究》2017年第6期。

⑥张江,奥特弗莱德·赫费齐:《“原意性阐释”还是“理论性阐释”——关于阐释边界的对话》,《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⑦参见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南帆:《作者、读者与阐释的边界》,《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南帆:《文学批评:开放的解读及其边界》,《东南学术》2009年第5期。

召唤阐释正义、当文本局部的“不可阐释性”影响阐释的整体性时,修辞阐释能否以及如何缓解文本现实与阐释边界的紧张?其中待挖掘、待探讨的未知,合成了修辞阐释和强制阐释互相缠绕的学术话题。强制阐释的讨论越深入,越可能关联某些折叠空间,修辞接续强制阐释话题,是可望打开的折叠空间之一。随着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一些隐蔽的东西会浮现,灰色区域会渐趋明朗。有关强制阐释的讨论和修辞阐释的潜对话,一方面为西方当代文论批评和中国阐释学建构提供中国学者的观察与解释角度,另一方面也为推进后陈望道时代中国修辞学科建设与发展吸纳中西方文论的思想资源。其学术价值不限于建构中国阐释学和建设中国修辞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而是基于人类知识共同体的中国经验的自觉在场。

四 中国修辞学界重大事件交汇的2022年:回望与前瞻

《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1期主持人语显示了2022年之于中国修辞学的特殊意义。这一年,中国修辞学界重大事件指向20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陈望道,开启中国修辞学陈望道时代的《修辞学发凡》问世90周年;陈著中国首部白话作文法专著《作文法讲义》问世100周年;陈望道诞辰130周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辞学习》(2010年更名《当代修辞学》)刊行40周年。凝望先驱,致敬经典,最好的方式,是在回溯陈望道时代和前瞻后陈望道时代之间找到逻辑链接点。

《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2期谭学纯的《融入大生态:中国修辞学研究突围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广义修辞观的学术逻辑和学术实践》谈到,陈望道最优秀的学术基因是修辞学术生产的知识结构“1+X”。这个“X”,在陈望道来说,真正延伸到了语言学科内外。基于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的修辞研究,理想状态是研究者调动“1+X”的知识库存,处理相关信息,完成学术叙述;读者的学术阅读调动“1+X”的知识库存,处理给定学术文献提供的相关信息。但在学科分化、学科分类管理和分割运作的背景下,修辞学术生产向多学科溢出的“X”,面临多重压力。

后陈望道时代,学科互渗融合和新文科转型的背景,以及修辞研究跨界学术共同体的合力推

动,改变了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此前“1+X”模式中被压制的“X”在变化了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中活跃起来。这个变化了的的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也是本节回溯与前瞻的参照系。

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变化,对于修辞创新性研究来说,不仅意味着已经改变了什么,还意味着可能改变什么。修辞研究趋势性的结构变化一旦发生,就会作为一种惯性影响学术再生产,并且按照这个节奏,影响学术市场,传导至学术史。受影响的修辞学术史叙述体制会有差异化的呈现形式,甚至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本身也参与了修辞学史的叙述,于是从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可以发现与之共生共变的修辞学史的叙述体制。

从中国修辞学发生到20世纪之前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修辞学术生产延续着某种“结构性相似”模式——修辞理论与诗学理论的共生形态,这也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提出“修辞诗学”概念,并将其与“修辞技巧”和“修辞哲学”共同视为“广义修辞三层面”的学理依据。20世纪之前中国修辞学史的叙述主线,主要从诗学史挖掘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从诗学史分离出的以“语言运用艺术”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古代、近代修辞学史,与诗论、词论、戏曲理论、小说评点等互相缠绕的叙述体制,在叙述的历史长度中,嵌入重要理论家和重要理论文献中可挖掘的修辞资源的宽度。这种叙述体制,随着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独立结构的形成和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诞生而改变。

20世纪之后,尤其是《修辞学发凡》出版以后,不再是诗学文献,而是修辞学文献成为支撑中国修辞学史的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基于“语言运用艺术”的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的独立结构,对应20世纪中国修辞学史的学术叙述体制。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的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区分实用性修辞学、文艺性修辞学和语文修辞学,三者的语言运用要求不同,而“语言运用艺术”作为中国修辞学史现有叙述体制的观察点没有改变。书海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涉及跨界修辞研究,跨界的学术生产主体主要限于语言学科内部。书中第八章将“修辞交叉学科和修辞应用的新成果”合并考察,第一节考察“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新著”六种,都是修辞学界的研究成果,分别为童山东《修辞学

的理论与方法》,吴士文、冯凭主编《修辞语法学》,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蒋有经《模糊修辞浅说》,陆家祥《内外生成修辞学》,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语言学科之外,进入《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叙述结构的有赵景深、郭绍虞、钱钟书的跨界修辞研究和茅盾、老舍、秦牧的文学语言研究,但从全书叙述主线看,作为修辞学史的主要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对应20世纪修辞学术生产结构,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大于超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其中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主体包括主要研究领域不是修辞学的语言学家,如胡光炜、金兆梓、杨树达、马叙伦、黎锦熙、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高名凯、王力等。这种叙述体制和全书的布局安排,至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出版的宗廷虎主编《20世纪中国修辞学》出现了总体框架不变的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调整,虽然叙述篇幅分配仍是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大于超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但增加了对语言学科之内非修辞学界跨界研究群体的关注,同时对语言学科之外的跨界修辞研究增加了较多篇幅:美学家、哲学家、文艺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如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朱光潜、陈垣、鲁迅、叶圣陶、朱自清、汪曾祺、王蒙、鲁枢元等人的修辞论或文学语言研究进入该书上下卷相关章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邢福义、汪国胜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改革报告:1978—2008》《语言学》卷第一编《汉语言文字研究概览》第七章《汉语修辞研究》,第二编《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概览》第四章第四节《修辞与文化研究》显示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和叙述篇幅分配,也是语言学场

域的修辞研究大于超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这些文献反映了学术史所涉历史时期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概貌。

21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多元格局伴随着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变化,这既是时代的变化,也是修辞学术生产顺应时代诉求的变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修辞学史将如何选择体现这种变化的叙述体制?尤其是近十年,一方面,修辞的“语言运用”外延在伸展:从个人修辞到机构修辞和国家修辞^①,修辞的公共性更加凸显;从人际修辞到人机修辞^②,人文的修辞和科学的修辞更加趋近。另一方面,非语言形态的国旗、国徽、国印作为国家形象修辞的共和国符号^③,非语言形态的“器”在博物馆的物性叙事中体现的修辞之“道”^④,以及语言形态和非语言形态的身体修辞^⑤,语言形态和非语言形态的景观修辞由“谁在观看/如何观看”,以及调动什么样的认知经验参与风景观看所导致的“心中之景”和“眼中之景”的认知差等等^⑥,诸多知识场域“非语言运用”的修辞,有无可能溢出“语言运用艺术”的“修辞”定义被21世纪中国修辞学史接纳?

如果不被接纳,那么是否将有一种书写在“语言运用艺术”的修辞学史之外的学术生产史?或者,“非语言运用”的修辞学术生产能否在未被修辞学史接纳之前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而存在?当然,如果不接纳,并不能改变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与修辞学史在事实上的“互文性”。

如果被接纳,情况可能更复杂。“非语言运用”的修辞学术生产以何种形式“入史”,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标准问题,而是修辞学史将以何种

①参见陈汝东:《论国家修辞学》,《江淮论坛》2012年第3期;胡范铸:《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专栏主持人语,《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4期、2014年第2期;《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胡范铸,金志军:《“公关语言”研究:“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探索的先声》,《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6期;鞠玉梅:《香港媒体“国家认同”的修辞建构——以〈南华早报〉粤港澳大湾区新闻文本为例》,《当代修辞学》2021年第5期。

②参见袁毓林:《“人机对话—聊天机器人”与话语修辞》,《当代修辞学》2021年第3期;道格拉斯·沃尔顿,俞米微,詹宏伟:《修辞与人工智能——教育学与语言学论辩理论中的形式对话模型》,《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4期。李宇明认为人机对话属于“超语”范畴,按:“超语”不是字面相近的“超语言学”的略缩表达,“超语”在威廉姆斯的原初解释中属于纯语言学概念;在李宇明的补充解释中,涵盖人机对话的“超语”也没有丢弃“语言运用”的属性。另见李宇明,刘鹏飞,任宇,等:《“语言与新媒体”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1期。

③信息来源: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共和国符号”专题节目。

④吴琼:《博物馆中的词与物》,《文艺研究》2013年第10期。

⑤参见谢有顺:《身体修辞》,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7—53页;郑竹群:《基于牛津系列期刊巴赫金怪诞身体修辞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杨森:《香港电影的女性身体修辞——以李碧华小说改编电影为例》,《文化艺术研究》2019年第3期;李萌昀:《“具体”的语言——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身体修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⑥参见潘红:《哈葛德小说在晚清:话语意义与西方认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165页;胡范铸:《以景观为方法》,《文化艺术研究》2023年第1期。

形式对应于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应于本文第一节所述修辞研究在语言学科之外的参与度>语言学科之内、且研究成果流向目标刊物的学术关注度也是语言学科之外>语言学科之内——其间有语言学科之内修辞研究者的参与和推动,那么现有中国修辞学史叙述体制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超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有无可能在21世纪从20世纪修辞学史的叙述边缘向中心位移?

作为一种参照,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文体从学术叙述边缘位置向中心位移,与文学生产结构变化的节奏大致对应。始于21世纪初,近十年尤显突出的高校文科学报和综合性社科期刊的栏目设置、编排位置的变化传递的学术信息,是否也可

以看作某种信号?这里不做简单比附和推论,但是修辞学史的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是否以及如何再分配,关乎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与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时代诉求如何合拍的问题,同时也是后陈望道时代中国修辞学科重建需要面对并做出回应的重大问题。21世纪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本身也在无言地发问:中国修辞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重建,如何面对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如何处置新的学术生产结构中的外源性智慧?如何平衡修辞研究的语言学科识别度和语言学科之外学术能见度的关系?如何在寻求语言学科内外修辞学术生产最大公约数的同时,探寻学科重建的可能性方案?

New Orientations in the Composition of Rhetor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over the Last Decade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China

TAN Xue-ch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orientations in the composition of rhetor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over the last decade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ew information, new resources, new impetus as well as research space extension in the field of rhetorical study jointly explored by academic communities within and beyond the linguistics discipline,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three important orientations in the composition of rhetorical study. Firstly, how intertextuality studies initiated by J. Kristeva and pushed forward by Chinese scholars lead to innovations in rhetorical study within and beyond the discipline of linguistics? Secondly, how the discussion on “mandatory interpretation” initiated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participated by foreign scholars serves to form potential dialogues with 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s? Lastly, in the year of 2022 marked by some important academic events,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rhetorical history was re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 in the process of new orientations in rhetorical study. Thi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faced is the academic productivity involving the discipline of linguistics and beyond in the disciplinary reconstruction of rhetorical studies in the post-Chen Wangdao era, which is also a crucial question that must be addressed.

Key words: composition of academic productivity; within and beyond the discipline of linguistics; rhetorical study;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责任校对 唐尧)